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 史官文化與史記

陳 桐 生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
史官文化與史記

陳 桐 生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 / 陳桐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民82
面；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56)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160-X(平裝)

1. 史記 - 批評,解釋等

6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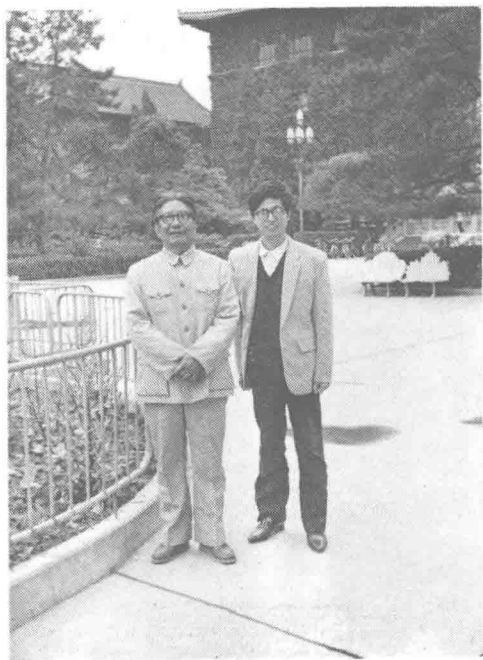
82008432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
(1992年陝西師大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陳	桐	生
指 導 教 授：	霍	松	林
發 行 者：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3635008
傳 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印數：10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330元
ISBN-957-668-160-X



作者簡介

陳桐生，安徽桐城人，一九五五年十月生。一九七三年下鄉當農民五年，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學，一九九二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主要著述有：《屈原與巫文化的興衰》、《史記與今古文經學》、《道與中國文化》（與人合譯）和論文二十多篇。現在廣東省汕頭大學中文系任教。

（圖為本文作者[右]與導師霍松林教授）

序 一

霍松林

經過三個寒暑的勤奮鑽研和深沈思考，陳桐生君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終於寫成，在答辯會上得到一致讚許，如今即將出版了。桐生索序，我樂於談談這篇論文的幾個特點，和讀者交換意見。

桐生博覽載籍，視野恢宏，思路開展。他不局限於就《史記》研究《史記》，而是把《史記》放在中華文化，特別是史官文化的背景中，縱橫考察，探本窮源，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史記》以前，中國史官文化的發展可分為上古三代的天人文化、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學和戰國史官文化三個階段；司馬遷正是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下形成了以天人感應為特徵的天道觀、以德治為核心的王道觀與及時建功立業的士道觀，由此構成《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金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偉構思。桐生曾說：司馬遷撰寫《史記》，其目光洞察兩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們研究《史記》，其目光不應比司馬遷短淺。他這種力求拓寬視野的努力是可取的，給論文帶來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由於比較準確地把握了《史記》的文化背景，因而能夠聯繫文化背景解釋《史記》學中的一些疑難問題。例如關於「八書」體制的來源，古今衆說紛紜。作者從漢家「受命改制」的文化背景考察，提出《史記》「八書」體制為司馬遷首創。其首創的依據，是陰陽五行學派和春秋公羊學派應天受命改制的理論和漢家

改制的實踐。禮、樂、律、曆、天官、封禪，都是改制的內容；《河渠書》與《平準書》，也與改制有密切聯繫。又如關於《史記》的思想歸屬問題，學術界或認為屬於道家，或認為屬於儒家，莫衷一是。作者則認為：從上古到秦漢之際，中華文化學術經歷了「道術為天下裂」和「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過程。在融匯百家的大趨勢下，《史記》以「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為宗旨，其學術思想，包容了王官學的六經和諸子百家之學。因此，將司馬遷的思想歸於儒道某一家是沒有意義的。從整合百家的角度來看，《史記》體現的思想接近於《易傳》。諸如此類，都是從考察文化背景和《史記》內涵中獲得的新認識。

作者撰寫此文，不依傍舊說，更不沿用舊說，而是從第一手資料出發，獨立思考，得出結論。如對《史記》天道觀，學術界的主導意見是天道自然、天人相分；此文則引證上百條資料，力主司馬遷天道觀以天人感應為特徵。學術界認為《史記》通變論中有發展進化觀點，此文則以許多證據表明：《史記》的通變觀與其天道觀一脈相通，以終始循環為特徵。作者指出：《史記》的進步性並不表現在天人宇宙觀和歷史觀方面，而是表現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平等觀念方面。《史記》最完滿地體現了一個偉大民族在結束動亂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特有的剛健篤實、自強不息精神。類似的新見解，文中還有很多，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供參考或引起爭論，把《史記》的研究引向深入。

桐生功底紮實，治學勤謹，對於中華文化的承傳有高度使命感。他願以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為起點，縱橫開拓，對《史記》作更深更廣的研究，祝願他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1993年初春寫於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序 二

王啓興

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攻讀古典文學碩士學位期間，桐生即在研讀先秦有關典籍的同時，對先秦時期的歷史、哲學、美學、文化、宗教等領域進行鑽研，這既為他以後的科研打下堅實的基礎，又擴大了視野，更培養了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考能力。最後桐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碩士學位，尤其是學位論文很有開拓精神，也頗多新意。八九年桐生考上著名古典文學史家霍松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始攻先秦兩漢文學，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重新深入研究，並確定為博士論文的論題。此後桐生於寒暑假返武漢探親，都來相訪，也免不了談及《史記》的有關問題，以及他對研究《史記》的一些想法。九一年初，桐生把他的《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提綱寄給我，徵求我的意見。當我認真地看完提綱後，異常興奮，感到提綱角度新，思路清晰，對《史記》的研究是一重大的拓展。當然，對一些章節，我也談了自己的意見。論文完成打印好後，桐生又很快寄給我，所以，我是最早閱讀這一論著的讀者。

《史記》多年來是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的熱點，也不乏有較高學術水平的論著，但我認為桐生的《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有其顯著特點。首先是角度新穎，高瞻遠矚。文化是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巨大力量，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人，總是優秀的民族文化的所孕育的，司馬遷及其《史記》正是先秦文化哺育的結果。桐生準確地把

握住這一關鍵問題，從文化學的角度，以宏觀的視野，把司馬遷的巨著《史記》置於先秦及西漢初的特定文化環境中加以研究，尤其是史官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這樣的研究不僅角度新，而且是深層的，因之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次是多層面地剖析，深刻精到。桐生以敏銳的追求眼光，從不同的方面論證《史記》深邃內涵，這裡既有縱向的考察其文化淵源，又有橫向論述西漢盛世氣象與司馬遷的文化心理，還深入論析司馬遷的天道觀、王道觀、士道觀等問題，多有發明，多有創見，把《史記》研究大大向前推進。再次是駁辯有力，成一家之言。在學術研究中，見仁見智，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百家爭鳴」，各抒己見，以推動學術研究向縱深發展。桐生在「謗書說」辯，《史記》思想近《易》說，以及司馬遷與董仲舒思想異同等章節中，經過周詳的論證，提出異於時賢的看法，言之成理。雖然這些問題尚可進一步討論，但桐生新論很有說服力，成一家之言。最後本書材料翔實，論據充分，讀之無空疏之感，我以為這也是一大特點。

桐生正值盛年，基礎紮實，思想活躍，眼光敏銳，加之有嚴肅認真的態度，富於開拓的精神，相信他會繼續從不同的方面研究《史記》，也相信他在巫文化與《楚辭》的研究中，會有新的突破，取得可喜的成績。我期待著。

1993年元月28日寫於武昌珞珈山

目 錄

序一（霍松林）	
序二（王啓興）	
引論	1
第一章 中國史官的天官職能與天人理論	3
一 中國史官的天官職能	3
二 《周易》的天人宇宙觀	15
三 陰陽五行學派的五德終始說	20
四 春秋公羊學的三統循環論	30
五 漢家改制中的理論熱點	37
第二章 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學	41
一 對孔子作《春秋》的文化認同	41
二 孟子對《春秋》文化意義的闡發	50
三 王道文化傳統的內涵	52
四 《春秋》三傳釋旨	55
五 孔子與六經	64
六 《史記》的文化定位	67
第三章 戰國士文化與史官文化	75
一 戰國士文化與史官文化的關係	75
二 戰國士文化之源	78
三 戰國士林的價值觀	81
四 戰國士林的文化心態	86
五 《易傳》《中庸》的超越哲學	96

第四章	司馬遷的生命體驗與文化心理·····	101
一	早期生命體驗·····	102
二	沐浴戰國士文化的流風餘韻·····	105
三	司馬遷的兩個精神支撐點·····	111
四	司馬遷與「自我實現者」的比較·····	115
五	血染的個性風采·····	117
六	司馬遷受刑後的心理分析·····	122
七	司馬遷的死亡之思·····	129
八	司馬遷的文化復仇心理·····	132
九	《史記》的半官史半私史性質·····	141
第五章	司馬遷的天道觀·····	145
一	《史記》的神學目的論·····	146
二	《史記》的天人感應論·····	157
三	《史記》的歷史循環論·····	168
四	《史記》「八書」的通變論·····	174
五	《史記》的經濟循環論·····	187
六	《史記》的天命崇高論·····	189
七	《史記》天命觀反例分析·····	199
八	《史記》「進化論」材料分析·····	204
九	《史記》求實精神的貫徹程度·····	207
第六章	司馬遷的王道觀·····	217
一	司馬遷對歷代帝王政治的評判·····	218
二	司馬遷論漢武興儒學·····	223
三	司馬遷論漢武伐四夷·····	226
四	司馬遷論漢武封禪·····	235

五	司馬遷論漢武經濟政策·····	239
六	司馬遷論漢武吏治·····	245
七	政治與文化的分離·····	249
八	天道與王道的溝通渠道·····	250
九	天道觀與王道觀的矛盾及其統一·····	251
第七章	司馬遷的士道觀·····	253
一	《史記》中變例分析·····	254
二	下層士林的豐碑·····	261
三	《史記》人物評價中的非道德化傾向·····	270
四	功名難遂的悲歌·····	275
五	對「烈丈夫」的禮贊·····	281
第八章	「謗書說」辯·····	285
一	司馬遷從根本上擁護漢家政權·····	286
二	《史記》貶損漢家的兩點依據·····	290
三	宮刑與《史記》的關係·····	297
四	「謗書說」的實質·····	307
第九章	《史記》思想近《易》說·····	309
一	秦漢之際的學術大趨勢·····	309
二	《史記》與《易》學·····	312
三	《易傳》與《史記》的宇宙觀·····	315
四	《易傳》與《史記》的通變論·····	319
五	《易傳》與《史記》的尚德思想·····	324
六	《易傳》與《史記》的人生觀·····	328
第十章	司馬遷與董仲舒異同考·····	333
一	司馬遷師承董仲舒說不能成立·····	333

二 司馬遷與董仲舒相同之點·····	346
三 司馬遷與董仲舒相異之點·····	359
四 幾點結論·····	363
第十一章 《史記》對中國史官文化的貢獻·····	365
一 《史記》對中國史官文化的總結·····	365
二 《史記》的精髓·····	369
注釋·····	374
主要參考書目·····	380
後記·····	382

引 論

史官文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范文瀾先生提出來的。范先生在劉師培、王國維、梁啟超等人關於學分南北的觀點影響之下，分別以史和巫概括南北文化的特徵。他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黃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黃炎族與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華族，巫史兩種文化並存，互相影響也互相鬥爭。」又說：「史重人事，長於徵實；巫事鬼神，富於想像。……《楚辭》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現。其特點在於想像力非常豐富，為史官文化的《詩》三百篇所不能及。戰國時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達到成熟期。」^①可見范先生所說的史官文化實際上就是指北方文化，這可以說是一種泛史官文化觀。這種泛史官文化以崇尚實際、重視人事為其基本特徵。上古三代時期史官在北方職掌文化，這是事實，但只要我們仔細推敲，就發現以史官文化來指代北方文化並非完全妥當。早期社會巫風盛行，殷商時期即是一個巫風瀰漫的時代。巫史最初頗不易分，而分離出來的史官主要是履行天文曆法、祭祀占卜、祥瑞災異等天官職能，仍有帶有濃厚的巫術色彩，至於論載倒在其次。

本文所說的史官文化則純粹是一種狹義概念，它是在下列兩層意義上嚴格使用的：一是指從上古三代到秦漢時期以史官階層為主體創造出來的文化，二是指借助於史學闡發的思想文化觀念。它是以創造主體與學科為區分標準，並不含有與南方巫官文化相對的意義，也不純粹是以崇尚實際重視人事為特徵。

本文認為，這種史官文化是直接孕育司馬遷巨著《史記》的文化土壤。

從上古三代時期到秦漢之際，中華民族文化經歷了從统一到分化，再從分化到整合這一過程。中國史官以其職業智慧自始至終參與了民族文化的創造，形成了獨具特色影響深遠的中國史官文化。在上古三代時期，史官因掌管天文術數而成爲中國文化學術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際，孔子從史學角度作《春秋》明王道，從而使王道成爲中華民族的文化哲學；戰國史官參與了戰國士文化的創造，形成了一種新的士林價值觀。中國史官文化以其獨特的創造而在中華民族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史記》誕生於民族文化的整合階段，它通過對此前史官文化傳統的總結，參與了秦漢之際規模宏偉意義深遠的民族文化整合工程。中國史官文化中的天人文化傳統、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學和戰國史官價值觀也就極其深刻地影響到《史記》著述，由此司馬遷形成了他的天道觀、王道觀與士道觀，構成了《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宏偉構思，《史記》也因此成爲司馬遷那個時代的文化崑崙。

注 釋

①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第一章

中國史官的天官職能與天人理論

中國史官的天人文化傳統，大致有兩條線索可尋：其一是經驗的線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術數方面的天官職能；其二是理論的線索，又可分為《周易》的天人宇宙觀和陰陽五行學派、春秋公羊學的宇宙論及其歷史哲學這兩個方面。在漢家受命改制的過程中，天人古今問題成為當時的理論熱點。這些天人文化傳統對司馬遷天道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成為《史記》天道觀的文化淵源。

一 中國史官的天官職能

「史」的本義是什麼？對此古今語言學界的理解歧異甚大。《說文》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從古文字形上考證「史」象手執簡形，非許慎所訓中正之義，即是說「史」是執簡記事的官員。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以為「中」是「簿書」，與今人所說的案卷同義，這與吳氏所說的「中」象手執簡形大致相同。章炳麟在《章氏叢書·文始》卷七中從字形、字音、字義三方面考釋「中」為記事簡冊。王國維在《觀堂集林·釋史》中以為「中」是盛筭之器，而筭與簡冊本為一物，同為史之所執，因此盛筭之「中」，亦可用之盛簡冊。

他的結論是：「中」是盛筭之器，而「史」為持書之人。以上幾家說法雖然還有一些差異，但都認為「史」的本義是手執簡冊記事的官員，在對「史」的釋義上漸漸達成共識。這些說法可能都受到《漢書·藝文志》關於「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的影響。思想上有了先入之見，然後再多方設證。近年來，語言學者和考古學者多不同意「史」的本義為持簡冊記事之官員的結論。胡浞咸《釋史》^①王貴民《說卣史》^②和趙誠《甲骨文簡明辭典》^③都釋「史」為「事」，以為史官之史是從職事之事分化而來。其中尤以胡浞咸《釋史》一文較有說服力。胡氏認為，如果「史」之本義為記事之官，那麼在「史」字創造之前就應該有歷史記載了。因為從文字開始創造進而用它記載歷史，再進而設置專官職掌歷史記載，並且形成記事必須中正的歷史理論，一定經過相當長的歷史時間。但「史」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反復出現，這說明「史」的本義並不是記事之官而是職事之官。「史」所履行的職事主要是祭祀和軍事，由於在宗廟祭祀時，祖先的世系由太史掌管，所以由記載世系而發展為歷史記載。由於年代綿邈史料缺佚，這一觀點多少還帶有一些假說的性質。但我認為胡氏之文的思路是大體可信的。最早的文化知識可能是原始宗教知識，而史官是中國上古時代最早的文化人，是職掌原始宗教的職事官員。中國史官從它誕生的開始階段就履行天文術數和祭祀之類的天官職責，並從天官職能中派生出記言記事的職能。即使是在記載職能產生以後，史官的職責仍以天文術數等宗教事務為主，這種情況直到司馬遷時代尚未改變，以致於有人說太史不是史官而是天官。

這裡面涉及到對原始文化特別是對原始思維的認識問題，以

上說法是建立在承認存在原始思維的進化論的觀點之上。在中國大陸，由於恩格斯的表彰與提倡，學術界對原始文化的解釋大體上取摩爾根《古代社會》中進化的觀點。這種觀點在西方受到結構主義學派、歷史學派和功能學派的批評。如列維—斯特勞斯從根本上否認有原始思維的存在，不承認原始人的思維較之於現代人的思維處於較低的發展狀態。他在《野蠻人的思想》一書中認為，當我們錯誤地以為野蠻人是完全被機體和經濟需要所統治之時，我們忘記了我們所達到的水平其實是和他們相差無幾的，他們尋求知識的願望甚至比我們更為均衡。功能學派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一書中認為，進化學派把文化的發展視作一串依著一定法則自動的蛻化，有一定次序的階段，而這些是臆測的和沒有意思的。但是進化論未便輕易否定，人類思維應該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國早期大量的敬天祀神依賴龜卜的記載表明，當時的思維方式主要是巫術思維或原始思維，這種思維以人與自然不分和萬物有靈為特徵。從現存甲骨文來看，占卜的內容極為廣泛，大到戰爭討伐和求雨活動，小到商王的起居，田獵、疾病，都要求神問卜。《禮記·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以事神為中心的原始宗教活動，是中國早期文化的主要內容，神統治了人，社會沈浸在一片神秘的巫術氛圍之中。

中國早期史官巫術色彩極濃。《周易·巽》卦九二爻辭云：「用史巫紛若。」這表明上古時期巫史頗不易分，史官履行巫師的職能，充當溝通天人之際的使者。劉師培在《古學出於史官論》一文中說：「三代之時，稱天而治，天事人事相為表裡，天人之學，史實司之。」又說：「吾觀古代之初，學術銓明，實史之績，試證之《世本·作篇》，則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更匡占星，